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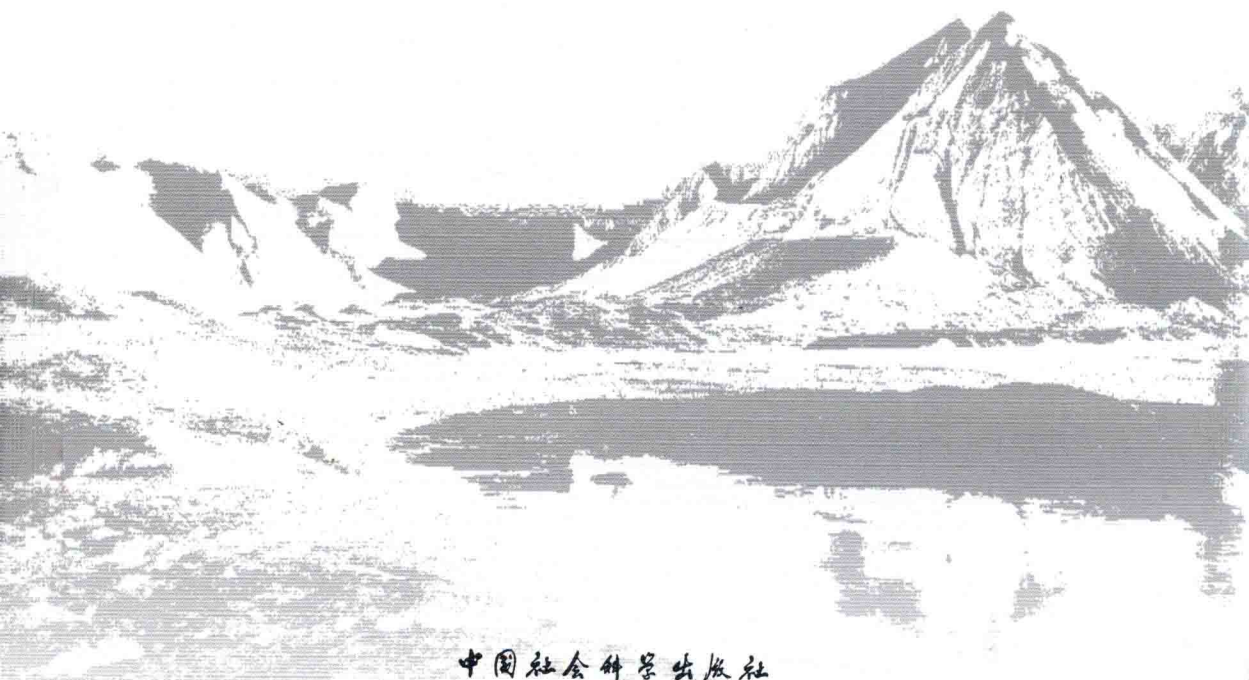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学人丛书

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 藏事论衡

车明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学人丛书

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 藏事论衡

车明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藏事论衡 / 车明怀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1684-2

I. ①中… II. ①车… III. ①西藏-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22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1.25
插 页 2
字 数 676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而又足以影响世界的大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涵盖了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历史创造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格局。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每一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初，本人就有志于中华各民族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在大学时期，曾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一部台湾学者编撰的多卷本、图文并茂的《江山万里行》，被祖国壮丽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所震撼，当时就立下了研读、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志愿。大学毕业后，带着万丈豪情与被称为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数千名各省市同仁来到祖国西南边疆西藏工作，从此与西藏这片高天厚土、历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藏、甘、川、青、滇的藏族聚居区与中华其他各地域、各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厚的历史、地理、人文资源，赋予了我学习、探究西藏及青藏高原各民族历史的冲动与意志，助推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徜徉在历史文化的海洋里。尽管如此，我一直认为个人只不过是历史海洋里的一叶扁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引，会永远不知方位地游弋着，永远找不到方向。正因为这种担忧，促使我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观察社会、分析问题，因而就有了在中华民族大历史背景下思考西藏地方史的认识，因而也就有了尽管不太成熟、但历史观还算有基本遵循的文稿。实际上这些文稿也得益于自己多年的调研与思索。在阅读大量史书的同时，还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西藏各地及青藏高原乃至与西藏历史、文化有联系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考察的足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昔日长安到拉萨的唐蕃古道；从柳园、敦煌到湟中、鄯州^①的古丝绸之路；从大理、丽江到中甸的滇西要

^① 今青海省的乐都一带。

地；从京城、张家口、呼和浩特、盛乐、太原、银川、黄河、长江、秦岭到汉中、利州^①、剑阁、成都、雅州、昆明、中甸、昭通、大理、康定、昌都、那曲、太昭、塔工、拉萨的驻藏大臣及涉藏官员、僧人过往通道；都是我研究历史文化的探究之地。松州^②、凉州^③、南坪、灌县^④、大非川、铤子栏^⑤、鹦哥嘴^⑥、泸水、剑川^⑦这些与藏事历史文化有关联、与各族人民联系、交往、交流、交融的古代地域，都留下我实地感悟、认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身影。在阅读与实地考察中，学会了历史比较，也深深认识到学习、研究西藏地方的历史，确实离不开中华民族大历史的背景，割断了西藏民族与各民族的历史联系，就等于割断了西藏历史存在的筋脉，一切命题将成为伪命题，一切成果将成为无根浮萍。以如此的观点和思考，断断续续地耕耘着并不太肥沃的历史田园，成就了这些历史观统一而又相互联系的文稿。

此次推出的文稿共分为六大部分，六大部分既有分类又相互联系。第一部分从解读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西藏地方史入手，研究分析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必然，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地理因素；研究西藏地方史应遵循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如何在中国大历史格局中书写西藏地方史等，以唯物主义的、符合历史进步规律的全新观点回应当下时隐时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校正一些“研究者”试图割裂西藏地方史与中华民族大历史相联系的偏差。第二部分则以探究明末清初的天下大势与清朝初期的藏事管理为主要内容，说明西藏地方历史的成因源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互动，即使世俗政权和教派的替代也是中国各个朝代更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反映，这种地域性的世俗政权和教派的替代不是孤立和封闭

① 今四川省广元市。

② 唐代为西南军事重镇，唐朝与吐蕃在此地进行过反复争夺，宋、明时期仍为军事要地，位于今四川省松潘县，今为汉、藏、羌等各民族杂居的地方。

③ 此地为元代时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会见之地，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市。

④ 南坪、灌县本为四川省内各民族杂居的县域，20世纪末，为了旅游的需要分别改为九寨沟县、都江堰市。

⑤ 大非川和铤子栏两地分别位于青海省兴海县境内和云南省德钦县与中甸交界的白茫雪山脚下，为古代唐蕃争夺的军事要地。

⑥ 位于四川省巴塘县，为晚清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蒙难之地。

⑦ 今云南西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历史上在这些地方由唐、大理、南诏、吐蕃演绎过许多重大战事。

的,是和中国西部各民族的互动相联系的,进而证实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历史联系的延续性和不可逆性。第三部分通过对200年的驻藏大臣的制度分析以及驻藏大臣责任意识的历史比较,特别是有选择性地分析乾隆年间和晚清驻藏大臣的形形色色表现,清晰地展露驻藏大臣的良莠不齐及其对西藏和清朝西部边疆安全和稳定的影响,并得出了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情况下驻藏大臣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历史结论。第四部分展露了民国时期藏事管理的乱局,以触目惊心的大事件说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后盾,国家边疆治理的威权在藏事管理中难以保障,西藏地方动荡不止、内部自相残杀不断,劳动人民只有承受着旧西藏及其封建农奴制度所造成的无尽苦难的历史真相。

本文稿最有历史比较特点的当属第五部分,本部分是以当代历史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是以新旧历史的比较为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对西藏经营与治理最成功、最典范的当属中国共产党人。这是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及边疆治理意识密切相连的。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的解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创了西藏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实现了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西藏的解放,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从此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和奴役;西藏的解放,使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的伟业,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在西藏地区有边无防的不利局面,基本上解决了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问题^①;西藏的解放,大大加强了国家对西藏地区的管理,结束了西藏内部的长期混乱和纷争,为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经营和治理西藏,其勇气和力度确实超出了历代王朝。和平解放前的几百年间,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一直停留在“羁縻”或仅仅委托地方土官“相机而治”的低层次、低效能局面,既没有像内地省份那样由中央政府直接设立基层组织,又缺乏自上而下的强力管理机制。即使到了清朝,也仅仅是委派驻藏大臣及少数随员等代表皇帝到西藏进行管理,而中央驻西藏常备军的员额也不稳定,以至于西藏常常出现地方势力坐大,甚至谋害中央大员和达赖喇嘛的恶性事件。尽管清朝中后期

^① 中国边疆西藏段目前还有一部分领土为印度占领。被占区域位于西藏南部的“三隅”地区,总面积有9万多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浙江省的面积。

采取了一些强化管理的措施,如制定“二十九条章程”、在藏东试行“改土归流”、在全藏推行“新政”等,然而因封建中央王朝制度性的缺陷并面临着内忧外患之困局,未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落后的管理形式不仅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常面临着外部敌人的侵扰,还为西藏地方各种势力的纷争内斗留下管理上的空隙,使西藏各族人民的的生活和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西藏的和平解放,彻底改变了封建王朝那种落后的管理形式,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肩负起保卫祖国边疆的重任,各级党政组织深入到基层,承担起管理社会、发展生产、发展文化事业,为各地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责任。特别是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推动了西藏社会的伟大跨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各级党政组织与各族人民一道建设西藏,管理地方,昔日那种部族纷争、邻里仇杀、山头林立、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从此彻底结束,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①。这些历史确实值得用浓重的笔墨大书特书。

文稿的第六部分用几万字的篇幅分析与揭露国际反华势力削弱中国的企图与达赖分裂集团的活动。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西藏自治区在国际的视野中渐被瞩目。这一方面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反华势力出于削弱中国的需要。而后的直接结果酿成了一种与国际发展大趋势不和谐的气氛。一些居心叵测的政客与达赖集团一道对我国西藏政策大肆攻击,而另一些以藏学研究者自居的“专家”们也从不同角度对“西藏问题”进行研究。国际反华势力与分裂主义的破坏给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制造了很多麻烦,干扰了中国的内政、外交工作。这种逆潮流而动的活动是与西藏的历史进步相对立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并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推动西藏社会进步、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的破坏捣乱,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撰写这一部分的目的也在于此。

实际上,我之所以选择以上内容,不过是希望将自己的历史观点展示出来,而全部文稿还未能上升到历史研究专著应有的水平,所以只能冠以

^① 本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人治理西藏的当代历史仅研究到20世纪末,21世纪的历史更加辉煌。一代代共产党人治边稳藏的辉煌历史与成就还需要假以时日研究与补充。

《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藏事论衡》的书名，“藏事”与“藏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含义则相距甚远。积几十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对历史和史学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寥若晨星，难以企及。作为历史爱好者，所写文字充其量不过是读书心得而已，真正写出有分量且能影响后世的历史著作，即使假以时日可否达到尚未可知，现在也只能借用前人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自己的历史观点而已。当然，作为喜欢与历史及先贤对话的人，何尝不希望能够写出影响后世的历史著作呢，那就要看后天努力与史学功力的造化了。最后，我还是用鲁迅先生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所称道的“脊梁”是我永远学习与追赶的典范和榜样。

作者

2015年8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西藏地方史解读	(1)
一 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必然因素	(1)
二 解读西藏地方史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	(40)
三 中国大历史格局中的西藏地方史解读	(76)
第二部分 明末清初的天下大势与清朝初期的藏事管理	(135)
一 明末清初的天下大势	(135)
二 蒙藏地区大角逐	(160)
三 清朝廷经略西部边疆的战略布局	(173)
四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183)
五 安定西藏设驻藏大臣	(196)
第三部分 驻藏大臣的责任意识历史比较	(205)
一 清朝盛世驻藏大臣对西藏变乱处置能力的分析	(205)
二 驱逐廓尔喀入侵时的驻藏大臣	(225)
三 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与藏政大改革	(237)
四 西藏第二次抗英斗争前后驻藏大臣的心智状态	(251)
五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266)
第四部分 民国藏事乱局留给后人的启示	(286)
一 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后盾,国家边疆治理的威权在藏事 管理中难以保障,藏事乱局首先损害的是国家主权和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	(286)
二 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后盾,不仅西藏地方动荡不止、内 部自相残杀不断,即使达官显贵、望族高僧也难逃被政敌谋 害的厄运	(314)

三 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后盾, 劳动群众只有承受着旧西藏 及其黑暗制度所带来的无尽苦难	(350)
第五部分 当代西藏历史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边疆治理意识	(382)
一 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经过	(382)
二 执行协议的八年岁月	(397)
三 西藏的民主改革及其特点	(415)
四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历史综述	(432)
五 人民当家做主与西藏社会历史的伟大跨越	(443)
六 新中国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455)
七 改革开放与西藏的“一个转折点”	(467)
八 西藏新时期工作的里程碑与深化治藏思想的认识及实践 ...	(485)
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西藏的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历史 过程	(512)
十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	(538)
第六部分 国际反华势力削弱中国的企图与达赖集团的分裂 活动	(554)
一 历史背景	(554)
二 20 世纪前半叶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居心	(562)
三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569)
四 世界列强对西藏由来已久的阴谋	(583)
五 国际反华势力为何选择了达赖集团	(589)
六 国际反华势力武装叛乱分子支持达赖集团的卑劣行径	(595)
七 达赖集团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图谋分裂祖国的活动	(605)
八 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几个阶段	(615)
九 国际社会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态度	(626)
十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启示	(637)
后记	(650)

第一部分 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 西藏地方史解读

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是在大一统意识的支配下而进步的，西藏地方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考察和研究西藏历史，离不开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的交流和政治的、地理的联系，离不开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形成，是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看，西藏的历史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她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融合的结果，是敞开民族的胸怀接纳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又能够融入中国大历史的开放性的历史。西藏地方史不单单体现于历史文字记载当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历史活动之中。为了说明这些，本部分从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必然，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文化、经济、地理因素，解读西藏地方史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如何在中国大历史格局中解读西藏地方史等方面展开研究，努力以新的视角解读西藏地方历史，以唯物主义的、符合历史进步规律的全新观点回应历史中的虚无主义，校正一些“研究者”将西藏地方史与中华民族大历史割裂的曲谬用心。

一 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必然因素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辉煌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的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完整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格局。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密不可分。一部中华民族史构筑了中国历史的大厦，而各民族的历史均属于这座大厦的一部分。考察中国境内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着眼，

注意民族区域史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必然联系。而考察西藏地区史也要注意中华民族历史的大背景,首先要明确与西藏地区史密不可分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分合状况

历史上各民族是由许许多多的部落实体聚合而成的,现今我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特别是大一些的民族,无一不是经过动荡、聚散、交往、融合、迁徙、变化而成的,没有哪一个民族自始就是单一的实体。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部落遗址就达 7000 多个。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特征看,不仅明确反映出几个大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系统,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族集团的情况。

华夏民族集团:在仰韶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东夷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起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南蛮民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昙石山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北狄和东北地区的民族集团:由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形成。

西域民族集团:由马家窑文化及西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成的。

西南民族集团:在茂州、云南、昌都、林芝等地文化遗址^①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远古时期,各民族集团形成的区域分别汇集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部族,各部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支持共同抗御着自然灾害,支持着中华文明的初始发展。这说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情况。

进入新石器后期,由于气候的原因和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各民族在发展中出现了快与慢的差距,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部族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夏族,产生并建立了夏朝。其后,夏朝发展到商朝,商朝又发展到周朝,而周朝是夏族奴隶制

^① 上述诸地考古发现,有营盘山遗址、元谋遗址和卡诺文化遗址,由于地理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原因,这些遗址时代年份相差遥远。

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夏族和各民族开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经过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争斗与汇合,夏族汇合了南蛮、东夷、西域、北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民族,形成了汉民族的基础。进入秦汉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基本建立,从此,汉民族在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体。

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民族汉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单一的汉族,她是在夏族融合了众多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汉朝而得名^①。在这一时期,居于汉族周围的各民族也在分化、融合、兴灭。无论哪一种民族集团,都不是单一的民族,都在不断地分合、发展,只是因为汉族发展、融合较快,形成了人数最多、居地最广的民族实体,历史把她推到了我国主体民族的地位。

经过秦汉时期,各民族集团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汉民族由于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更加成熟与庞大,而其他民族集团,有的部分融于汉族之中,有的则分合为匈奴、西域、西南夷番、东北乌桓,鲜卑、挹娄,西部羌狄、南方众越和武陵蛮等大的民族。在这众多的民族之中,无论处于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还是分别建立不同的邦国政权,它们之间的关系已进入了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阶段。由于当时各民族所处的地位和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汉族和匈奴、丛^②越和西域诸族成为当时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而其他民族的活动随着汉、匈奴、丛越、西域诸族的征战、动荡、分合的辐射而不同程度地变化着。

汉朝对其统治下的民族,除设郡县以治之外,还根据各民族的不同特点,设立“属国”“刺史部”“都护府”等。如在四川设广汉、蜀郡、犍为、益州等属国,在甘肃设张掖、居延等属国,在西南、西北设立管理夷、氏、羌、狄的刺史部、都护府。经过秦汉大约440年的统治,我国各民族关系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的密切往来,形成了一个以秦、汉为统治基础的各民族统一的共同体雏形。

东汉灭亡后,我国进入了魏晋隋唐时期。从魏晋到隋唐,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这时,周边民族族体不断扩大,有的分化,

① 汉族的历史渊源,在大型电视片《汉源》中有详细的介绍,进入今陕西汉中考察,可发现许多汉族起源的历史古迹。

② 丛:指活动于巴蜀一带及西南部的诸多部族,李白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说。这里将活动于西南一带的诸族合称为“丛”。

有的合并,较著名的除汉族之外,还有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吐蕃、柔然、回鹘、突厥、吐谷浑、靺鞨、室韦、契丹、僚、越等,在700年的历史大变动中,各民族之间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外,其他时期基本为群雄割据,汉族和其他政权鼎立、互相交叉,形成大动荡、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民族关系有着显著的特色。

首先,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大规模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各类政权,各民族在中原大地上又争夺、又联系、又分化、又融合,其结果是各民族关系更为密切,许多民族之间已不能分离。

其次,由于南方政局相对稳定,黄河流域的汉族大批南迁,南方土著民族迅速接受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加速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此时,南方地区各民族的结合也趋于紧密。

再次,由于汉族的南迁北合,两股汉族力量带动了南、北方民族的融合,一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既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带动了南、北方的发展,为隋唐各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又一个大一统的时期。唐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它汇聚了汉、突厥、回鹘、西域、吐蕃、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等族。其中虽然有一些民族聚居区处于与唐王朝割据的状态,如南诏、吐蕃等,但他们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治力量逐渐衰弱,各少数民族向唐王朝挑战,都城长安经常受到吐蕃、突厥、回鹘的进攻,南诏也常常骚扰西南地区,这些民族有时入主内地,有时又割据一方。其内部也经常处在分合争斗状态,但仍然在唐帝国大文化和大历史的影响下活动。

唐朝时期推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团结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树立起前所未有的威信,所以,唐太宗成了统一多数民族国家的缔造者,被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天至尊”,成为各民族共同尊敬的帝王。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既是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成果,又是隋唐时期积极的民族政策的体现。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加快了汉化的进程,汉族也接受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使隋唐时期成为中华民族高度发展和统一的时期。

唐朝末年,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出现了军阀混战、藩镇割据、各少数民族自立为王的局面。这时候突厥人的一支沙陀部进入中

原,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在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本身也出现了分裂局面,如原来较为强大的吐蕃也分裂成若干割据势力。但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又互相交往、交流、交融,有的人主中原,有的兼并诸部族而称王,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唐宋交替时期,居住在北方的契丹族,合并诸部族而建立契丹国,后称辽朝。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但在中国境内的割据政权并立状态并未结束。在以后长达319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中出现了宋、辽、西夏、金、南宋、元等列国对峙的局面。在他们对峙之中,其他少数民族也乘机建立割据政权,如部分契丹族西迁后建立了西辽,回鹘建立了喀喇汗、于阗、高昌等割据政权,西南有吐蕃分裂后的各部相互争斗,还有云南大理国、大南国。而河湟、甘陇一带有吐蕃北迁的一支建立的唃廝罗政权。

在全国政治分裂状态下,又分化出许多小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在中央政权分裂、各地相互割据无力控制的情况下而出现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特色自称一族。实际上都是由大的民族分裂而成的。根据当时史料记载,仅北部的辽国就有族属59个之多即“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①。由于各小族形成的原因不同,各族之间呈现较为复杂情况,但彼此联系是主流,而相互争斗有的是为了各小团体的利益,大多是为兼并对方而向往更大的统一政权。

这一时期的汉族、突厥、契丹、女真、党项、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居于各统治区域民族关系的主体地位,而其他民族基本上附属于这些民族。

在这段时期内,各较大民族政权之间,既有相互争夺的一面,又有和平相处的一面,既有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又有矛盾斗争的一面。总的来说,各族人民之间和平相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趋于密切。契丹灭渤海后,逐渐统一了我国东北和北方广大地区。契丹强盛后,欲霸中原,曾与梁、唐、晋、汉、周等割据政权发生密切关系。后唐灭亡后,契丹从后晋傀儡皇帝石敬瑭那里获取了燕云十六州农业发达区,以后又与北汉结为父子之国,势力扩展到晋冀北部地区。北宋建立后,曾与契丹建立的辽朝兵戈相见,但在军事上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宋辽出现对峙局面。金朝是女真族在反对辽的压迫中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政权,通过对北宋的战争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在灭亡北宋后,占据了淮河以北地区,与南宋处

^① 《辽史》卷36,《兵卫志·属国军》,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第293页。

于长期对峙局面。西夏处于各朝之间,名义上臣服于宋、辽、金,但政治上保持着自治特权,它向东依恃辽、金,蚕食宋西北管辖之地,向西则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但他们的历史都是我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

13世纪初,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后裔,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崛起于大漠,他及其子孙窝阔台、拖雷、阔端、蒙哥、忽必烈率领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先后灭亡了西夏、金、大理,收服了青藏高原各割据政权,最后打败南宋,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的元帝国。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融合创造了客观有利的条件,为明、清大一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元王朝在历代王朝管理少数民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在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统治的土官制度,对少数民族进入汉族聚居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加速了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迁居于中原地区的契丹、女真族,迁居于江淮地区的党项族都先后消失,成为汉族的一部分。统治于全国的蒙古族、色目人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也逐步走向统一于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潮流;西藏分散的割据政权,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萨迦政权的带领下,纳入元朝的有效管理,并接受了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和文化的元朝近百年的时间内,各民族处于一个大聚合的状态。

元朝末年,爆发了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各民族大起义。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北伐,夺取中原,会师北京,元顺帝北迁。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汉族为统治主体的新的王朝。但明朝并没有像唐、元两朝那样将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统一于一体,虽说大部分地区归于明朝统治,然而北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在一些蒙古领主的统治之下。这些蒙古领主既留恋于元朝时期的统治,又羡慕长城以南的富饶,寄希望于明朝对其册封。但又常常领兵南下掠夺。明英宗时期,社会矛盾加剧,流民问题严重,各族人民不断起义,与此同时,明在北部与蒙古领主不断战争,南方土司也乘机叛乱。1449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蒙古领主也先视英宗皇帝若至宝,以此向明朝要挟勒索。16世纪后,张居正改革,政治局势好转,明与蒙古领主建立了互市通贡关系,全国一度趋于合一,明朝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这时蒙古俺答汗^①

^① 俺答汗,蒙语为“阿喇布坦”,元朝后裔,1578年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与西藏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会见,双方互赠名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金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后世称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

也被明王朝封为顺义王。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族首领乘明朝政治腐败之机而起兵，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其后又征服漠南蒙古，改国号为大清，确定“满洲”族名，把长城以北的各族融于满族之内。1644年，清军入关，打败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又灭南明，安定青藏高原，打败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罗布藏丹津的叛乱，平定三藩割据政权，收服台湾，设立驻藏大臣制度，实现了全国空前的统一，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版图。到清朝中期，清王朝统治范围为：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南起南海的东沙、中沙、南沙、西沙诸岛，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西南至克什米尔、不丹、锡金，面积足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鼎盛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发展。

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工商业也日趋发展，内地发达的经济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辐射，促进了边疆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如：漠南蒙古地区民族关系处于“相安已久”“内外一家”的升平景象；南方民族地区“野无旷土”，禾粟繁茂，川、藏、陕、甘、青等地商旅络绎不绝，茶、盐、粮、畜贸易频繁不断；东南武陵地区、台湾地区、海南地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不管在内地还是在边疆，社会经济都有了明显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牢固。

明清时期，我国已由宋元时期的上百个民族缩减为几十个民族，虽然族称仍然繁多，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已基本定型，每个民族聚居区的各民族之间也趋于稳定，其中的多数民族与现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相一致起来。各族的族名分别为：汉、女真（满）、蒙古、回回、黑斤（赫哲）、索伦（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古里迷、苦兀（苦夷）、朝鲜、东乡、蒙古儿（土）、撒拉、保安、撒里畏兀儿（裕固）、哈萨克、畏兀儿、布鲁特（柯尔克孜）、镑拍、搭吉克、俄罗斯、搭塔尔、藏、羌、门巴、珞巴、罗罗（彝）、蒲满（布明）、民家白人（纳西）、和泥（哈尼）、傈僳、阿昌、怒、巴苜（普米）、山头（景颇）、倮（独龙）、百夷（傣族）、嘎喇（瓦）、越（京）、攸乐（基诺）、崩龙（德昂）、倮（拉祜）、苗、瑶、黎、僮（壮）、毛难（毛南）、土家、仲家（布依）、侗、水、仡佬、仡佬、畲、东番（高山）等。其中有些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多种，各民族的社会发育情况也不平衡，但这一时期，汉民族的数量越来越